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馆解说词



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
一九八二年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馆 解 说 词

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

一九八二年三月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馆解说词

从一九二七年八月到一九三七年七月，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在介绍这个时期以前，先简要介绍一下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和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

中国共产党的诞生

从一八四〇年鸦片战争到二十世紀初期，各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列强相继侵入中国，使中国逐步变成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国家。占全国人口只有百分之十四的地主富农，占有全国土地的百分之八十一；而占全国人口百分之八十六的农民，却仅占百分之十九的土地。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势力相勾结，残酷地剥削和压迫中国人民。

随着外国资本主义的侵入和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中国的无产阶级也逐步成长壮大起来。这就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奠定了阶级基础。“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下，一九一九年中国爆发了反帝反封建的“五四”运动。中国无产阶级作为独立的政治力量，投入到这个运动，第一次登上政治舞台，这就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为党的成立作了思想上和组织上的准备。

“五四”运动以后，一大批宣传新思想、宣传社会主义的进步刊物和社团如雨后春笋般地在各地涌现出来。在宣传新文化、新思想的运动中颇有影响的陈独秀与李达、李汉俊等人，在上海首先成立了共产主义小组，创办《共产党》月

刊，推动了各地共产主义组织的建立。同年十月，李大钊与邓中夏、张国焘、罗章龙等人在北京也组织了共产主义小组。与此同时，毛泽东等也在湖南积极开展革命活动，先后组织新民学会，主办《湘江评论》，宣传十月革命，传播马克思主义，并建立了共产主义组织。此外，董必武、陈潭秋在湖北；王尽美、邓恩铭在山东；谭平山、陈公博在广东；施存统、周佛海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中；蔡和森、赵世炎、周恩来等在欧洲的中国勤工俭学的学生中，也都积极地进行建党活动。

一九二一年七月，各地共产主义小组选派代表，在上海召开了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参加大会的有毛泽东、李达、董必武、陈潭秋、何叔衡、王尽美、邓恩铭、李汉俊等十三人。共产国际的代表也出席了会议。大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党纲，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中国有了共产党，中国革命的面貌为之焕然一新。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 我党早期的军事工作

党成立以后，大力领导了以反帝反封建为主要内容的工人运动。后来，又领导开展了农民运动。

党在领导工人运动的斗争中，特别是从一九二三年“二七”大罢工失败的惨痛教训中，逐步认识到要战胜帝国主义、封建主义这样强大的敌人，必须有强有力的同盟军和革命的武装力量。

一九二三年六月，中国共产党在广州召开了第三次全国

代表大会，确定了同以孙中山为首的国民党建立统一战线的正确方针。

一九二四年一月，在中国共产党和共产国际的帮助下，国民党在广州召开了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李大钊、毛泽东、瞿秋白、林伯渠等许多共产党人出席了大会，其中有些被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或后补委员。接着又改组了国民党中央党部，共产党人担任了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和农民部的部长，工人部实际上也由共产党员领导。

一九二四年五月，在我党和共产国际的帮助下，国民党在广州建立了黄埔军校。党先后派周恩来、恽代英、熊雄、肖楚女、聂荣臻等担任军校的政治领导工作和军事教官，并选派了许多党、团员到军校学习。这是我党从事军事工作的开端。

一九二四年十一月，在周恩来同志的主持下，以黄埔军校毕业生中的部分共产党员为骨干，在广东肇庆建立了我党领导下的一支武装力量——铁甲车队。第二年发展为独立团。这支武装在建立广东革命根据地，平定地主武装叛乱方面，起了重要作用。

一九二五年二月和十月，国民革命军举行了两次东征，讨伐盘踞在广东东部的军阀陈炯明。周恩来担任东征军总政治部主任，亲自参与领导了为统一广东革命根据地而进行的军事、政治斗争。《东征纪略》一文，记载了第二次东征的胜利。

一九二六年七月，广东革命政府开始了讨伐北洋军阀的革命战争。以共产党员叶挺为团长的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独立团作为北伐先遣队；在其他各军中也有不少共产党员从事政

治工作或担任国民党的党代表。在此期间，周恩来发表的《国民革命军及军事政治工作》的演说，总结了我党从事革命军队政治工作的最初经验。

叶挺独立团于一九二六年五月出师，六月四日首战告捷，攻克湖南攸县，打开了北伐军进入湖南的通路。八月二十六日至三十日，在汀泗桥和贺胜桥，击溃了吴佩孚的主力。十月攻占了武昌。由于叶挺独立团的英勇善战，屡破强敌，四军赢得了“铁军”的称号。

北伐战争的胜利，推动了工农运动的进一步高涨。在李立三、刘少奇等领导下，汉口工人收回英租界。上海工人在周恩来、罗亦农、赵世炎、汪寿华等领导下，举行了第三次武装起义，经过浴血奋战，完全占领了上海。

毛泽东在这一时期先后发表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和《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等重要著作，科学地分析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经济地位和政治态度，估计了农民在中国革命中的伟大作用，集中了当时党内的正确主张，提出了关于民主革命的基本指导思想，批驳了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的错误。

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 的严重危害 大革命失败

北伐战争的胜利和工农运动的猛烈发展，严重地打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在中国的统治，更加引起了国内外敌人的恐惧。在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支持下，蒋介石于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二日发动反革命政变，在上海、南京等地袭击工

人纠察队，大批逮捕、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在这危急关头，许多共产党人主张坚决予以反击。赵世炎、罗亦农、陈延年、李立三、周恩来等致电党中央，建议迅速调动我党影响较大的北伐军，沿长江东征讨蒋；上海二十万群众也举行了声势浩大的讨蒋示威游行。但推行右倾投降主义的总书记陈独秀，却一再退让，甚至与汪精卫发表联合宣言，为蒋介石辩护，使反革命气焰更加嚣张。

四月十五日，广州国民党当局叛变；五月十七日，独立第十四师师长夏斗寅在宜昌叛变；五月二十一日，第三十五军军长何键指使其部下许克祥在长沙叛变；七月十五日，汪精卫在武汉也公开叛变。至此，轰轰烈烈的第一次大革命遭到了失败。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的失败，在客观上是由于敌人力量的过于强大，在主观上是由于党当时还比较幼稚，又处在陈独秀投降主义的领导下，放弃了对于统一战线、对于农民、特别是对于军队的领导权，因而当蒋介石、汪精卫向革命进攻时，党无力组织有效的反击，招致了大革命的失败。这是党的历史上的一次血的教训。

下面介绍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

中国工农红军的诞生 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创建

南昌起义

大革命的失败，使我们党懂得了：“在中国，离开了武装斗争，就没有无产阶级的地位，就没有人民的地位，

就没有共产党的地位，就没有革命的胜利。”为了挽救革命，一九二七年八月一日，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前敌委员会和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领导北伐军三万多人，于江西南昌举行武装起义，打响了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从此，开始了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革命武装斗争的新时期。起义胜利后，由于部队没有同当地农民运动相结合，在南下广东途中，于十月初在潮汕地区遭敌优势兵力的围攻而失败。保留下来的部分武装转移到海陆丰和北江地区，继续坚持斗争。

一九三三年七月一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决定，每年“八一”为中国工农红军纪念日。从此，“八一”成为我军的建军节。

党的“八七”会议

一九二七年八月七日，在瞿秋白的主持下，党中央在汉口召开了紧急会议。会议总结了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结束了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在党中央的统治，撤销了他的领导职务，选举了临时中央政治局，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并把发动湘、鄂、赣、粤农民举行秋收起义作为当前党的最主要的任务。会议中，毛泽东强调指出：今后党“要非常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八七”会议使党大进了一步，但在反对右倾的同时，没有注意防止“左”倾情绪的滋长。

“八七”会议后，陈独秀同刘仁静、彭述之等人成立反党小组织，公开分裂党。一九二九年十一月党中央作出决议，开除了陈独秀等人的党籍。

湘赣边界的秋收起义

“八七”会议后，毛泽东作为中央特派员被派到湖南，在长沙召开了改组后的湖南省委会议，传达了“八七”会议精神，并作了重要讲话，指出：“我们党从前的错误，就是忽略了军事，现在应以百分之六十的精力注意军事运动。实行在枪杆子上夺取政权，建设政权。”会议讨论和制定了秋收起义计划，并成立了党的最高领导机关——前敌委员会，毛泽东任书记。随后，毛泽东在安源张家湾召开会议，具体部署了秋收起义。

一九二七年九月九日，湘赣边界的秋收起义爆发了，以卢德铭为总指挥，以余洒度为师长的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分别从修水、铜鼓、安源出发，进攻长沙。受挫后，毛泽东放弃了攻打长沙的计划，于九月十九日把各起义部队集中于浏阳文家市，在这里召开了前委会议，决定向井冈山地区进军。十月，部队在永新县三湾村进行了改编，把原来的三个团缩编为一个团，即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一团，并在部队中建立了共产党的各级组织，确定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从政治上、组织上奠定了新型的人民军队的基础。

三湾改编后，部队到达古城，毛泽东在这里召开了前委扩大会议，总结了秋收起义的经验教训，决定在井冈山建立革命根据地。

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创建 红四军的成立

一九二七年十月，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的部队到达井冈

山，创建了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井冈山位于江西、湖南两省交界的罗霄山脉中段，这里反动势力薄弱，便于利用两省军阀的矛盾；党和群众的基础较好；地形险要，能攻能守，便于作战；周围各县物产也比较丰富，便于红军筹粮筹款。

为了加强人民军队的建设，一九二八年春，毛泽东为工农革命军规定了三项纪律，同年夏又规定了六项注意。红军战士们把六项注意写在包袱皮上。行军时背着，宿营时挂起来，自觉对照，严格遵守。

一九二八年初，朱德、陈毅等率领南昌起义保存下来的部队，转战到湖南南部，进行游击战争，结合宜章、郴州、耒阳、永兴、资兴等地农民武装，在地方党组织的配合下，发动了湘南起义。四月，朱德、陈毅等率领部队和湘南农军来到井冈山，于宁冈砦市同毛泽东领导的部队会师。五月，成立了工农革命军第四军（随后改称工农红军第四军），朱德任军长，毛泽东任党代表，王尔琢任参谋长。

井冈山军民，在毛泽东、朱德等的领导下，排除了“左”倾盲动主义的严重干扰，采取正确的政策和战略战术，一次又一次打破敌人的进攻，取得了许多胜利。一九二八年六月二十三日，龙源口一战歼敌一个团，击溃敌两个团，缴枪千余支。红军第四次击破江西敌人之后，根据地拥有宁冈、永新、莲花三个县的全部，吉安、安福、遂川、酃县各一部，为湘赣边界的全盛时期。在斗争实践中，毛泽东、朱德等总结出了“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原则。这十六字诀，包举了反“围剿”的基本原则，包举了战略防御和战略进攻的两个阶段，在防御

时又包举了战略退却和战略反攻的两个阶段。我军后来的作战原则，都是在它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一九二八年五月二十日，中共湘赣边界第一次党代表大会在宁冈茅坪召开，毛泽东被选为湘赣边界特委书记。五月下旬，在茅坪的苍边村成立了湘赣边界工农民主政府。同年冬，毛泽东在总结土地革命经验的基础上，制定了《井冈山土地法》。

一九二八年十二月，彭德怀、滕代远等率领红五军主力，到达井冈山，进一步壮大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武装力量。

在这一时期，毛泽东先后发表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等著作，总结了井冈山和其他革命根据地斗争的经验，论证了红色政权能够发生、发展的原因和条件，回答了红旗到底能打多久的问题，提出了“工农武装割据”的光辉思想，从理论上和实践上为中国革命开创了一条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道路。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典范，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史上的伟大创举，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武装夺取政权学说的重大发展。

一九二九年一月，毛泽东、朱德、陈毅等率领红四军主力向赣南进军，留在井冈山的红军和地方武装继续坚持斗争，到一九三一年秋，形成了以永新为中心包括萍乡、新喻等十余县的湘赣革命根据地。坚持在这一地区的红军到一九三二年二月，发展成为红八军，一九三三年六月，红八军与湘鄂赣革命根据地的原红十八军会合，组成了红六军团。

广 州 起 义

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十一日，中共广东省委书记张太雷和叶挺、恽代英、叶剑英、杨殷、周文雍、聂荣臻等领导了广州起义，建立了广州苏维埃政府，发表了《告民众书》。这次起义是党领导革命人民向反革命势力进行的一次积极的、英勇的反击，是党领导工农武装夺取政权的又一次伟大尝试。但起义部队由于受到优势敌人的围攻又未及时转入农村而失败了。张太雷也在战斗中英勇牺牲。起义的部分武装转移到海陆丰和广西农村，继续坚持斗争。

各地武装起义和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创建

一九二七年到一九三〇年间，除南昌、秋收、广州起义外，党还先后领导了海陆丰、湘鄂西、黄麻、弋横、渭华、平江、海南岛、左右江、福建的龙岩、永定、上杭以及其他各地的武装起义。这些起义，都在不同程度上打击了敌人，扩大了革命影响，为创建红军和农村革命根据地提供了经验，创造了条件。

一九二七年四月至十月，广东海丰陆丰的农民在彭湃等领导下，先后举行了三次武装起义，建立了革命政权。一九二八年四月，海陆丰工农政权在优势敌人的进攻下遭到失败。但是，东江人民在党的领导下，仍坚持了长期的革命武装斗争。

一九二七年秋到一九二八年夏，洪湖、湘鄂边人民，在贺龙、周逸群、段德昌等领导下，举行了多次起义，先后建立了红四军和红六军，创建了湘鄂西革命根据地。一九三〇

年七月，红六军与红四军（后改称红二军），在湖北公安县会师，成立了红二军团，贺龙任总指挥，周逸群任政治委员。

一九二七年十一月，潘忠汝、吴光浩等领导了湖北黄（安）麻（城）起义，成立了工农革命军鄂东军，创建了鄂豫边革命根据地。后部队改编为红十一军第三十一师。一九二九年，李梯云、周维炯等在河南商城；舒传贤、周玃之等在安徽六安、霍山领导了武装起义，创建了豫东南、皖西革命根据地和红三十二师、三十三师。一九三〇年二月，这三个地区连成一片，形成了鄂豫皖革命根据地。一九三一年一月，这些地区的红军和鄂东南、赣西北的红十五军合编为红四军，后发展为红四方面军。

一九二八年一月，方志敏、邵式平等在江西弋阳、横峰领导了武装起义，经过艰苦的游击战争，建立了红十军和赣东北革命根据地，后发展为闽浙赣革命根据地。

一九二七年秋到一九三一年间，杨善集、王文明、冯白驹等在海南岛地区领导了多次武装起义，建立了红军和琼崖革命根据地，并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坚持了长期的游击战争。在那艰苦的岁月里，医疗器械十分缺乏，红军战士就用香麻树皮做绷带，用槟榔树皮自制消毒盘等。

一九二八年七月，彭德怀、滕代远、邓萍、黄公略等领导了平江起义，成立了红五军，活动于湘鄂赣地区。同年十一月，除留一部坚持湘鄂赣区斗争外，彭德怀、滕代远等率红五军主力上井冈山与红四军会合。一九二九年初，红四军主力开赴赣南闽西。红五军坚守井冈山，遭数十倍于我之敌的强攻，经浴血苦战，红五军突围至赣南，曾经攻克零

都、安远、瑞金等县城，再次与红四军会合。不久，又回到井冈山，恢复了湘赣边区，并向北发展，打通了湘鄂赣与湘赣、鄂南的联系。一九二九年冬，红五军所部编为五个纵队。次年六月，根据中央指示，以此五个纵队为基础，结合地方武装，扩编为红五军、红八军，两军合组为红三军团。彭德怀任总指挥，滕代远任政治委员。随后，湘鄂赣独立师又扩编为红十六军，也属三军团建制。

一九二九年十二月，邓小平、张云逸、韦拔群等在广西右江地区，领导了百色起义，建立了根据地和红七军。翌年二月，邓小平、李明瑞、俞作豫等又领导了左江龙州起义，成立了红八军。不久，因强敌进攻，红八军退至右江编入红七军。一九三一年春，红七军主力转移到湘赣革命根据地。同年七月又转战至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兴国地区，后编入红一方面军第三军团。留下的部分武装，继续坚持右江地区的革命斗争。

一九二七年十月，唐澍、谢子长等领导了陕西的清涧起义。一九二八年四月，唐澍、刘志丹、谢子长等又领导了渭华起义。经过艰苦曲折的斗争，先后开辟了陕北、陕甘边、神府革命根据地，建立了革命政权，并先后成立了红二十六军和红二十七军。

赣南、闽西革命根据地的开辟

为了粉碎湘赣之敌对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第三次“会剿”，一九二九年一月，毛泽东、朱德等率领红四军主力向赣南进军，继而又挺进闽西。红四军粉碎了敌人的追击堵截，先后与江西红军独立第二、第四团和闽西邓子恢、张鼎丞

等领导的武装会合。在进军途中，毛泽东亲自起草了红四军四言体布告。

红四军在地方党和群众武装配合下，开辟了赣南、闽西根据地。后来，这两块根据地连成一片，发展成为中央革命根据地。

一九三〇年六月，在闽西的长汀，以红四军为骨干，与赣南武装组成的红三军和闽西武装组成的红十二军合编成立了红一军团。朱德任总指挥，毛泽东任政治委员。

红四军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

一九二九年十二月，红四军在福建省上杭县古田镇召开了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即著名的古田会议。会前，毛泽东深入连队进行了大量的调查研究。会议通过了毛泽东根据中央九月来信的精神起草的《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是决议案的第一部分。决议总结了南昌起义以来红军建设和红四军党的建设的经验，强调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批判了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坚持以无产阶级思想来建设人民的军队，它是我军政治思想建设的伟大纲领。

决议明确规定“中国的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红军决不是单纯地打仗的，它除了打仗消灭敌人军事力量之外，还要负担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以至于建立共产党的组织等项重大的任务”。

决议强调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党的正确路线教育军队，必须健全各级党委和政治委员制度，加强各级政治机关特别

是连队党支部的建设。红军战士创作的宣传画——党支部是火车头，形象地反映了党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红四军政治部根据古田会议决议精神制定了《红四军各级政治工作纲领》。

决议还规定红军应加强军政之间和军民之间的团结。在红军内部“厉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生活”制度，发扬官兵之间和同志之间的阶级友爱，建立士兵代表会议和士兵委员会，实行经济民主和经济公开。

毛泽东历来重视在红军中建立严格的纪律，早在井冈山时期就为红军规定了《三大纪律六项注意》，后不断修改补充，到一九二九年，成为《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它体现了人民军队的本质，是我军政治工作的重要内容，是毛泽东无产阶级建军原则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古田会议决议，不仅在红四军中实行了，后来各地红军也都程度不同地照此做了，它对党和军队的建设发挥了重大作用。

中国工农红军的发展和反“围剿”斗争

红军的发展壮大 红一方面军成立

党的“六大”（一九二八年六、七月）以后，红军和革命根据地有了很大发展。到一九三〇年，全国已有十几块革命根据地，红军发展到十多万人。一九三〇年六月，在李立三主持下，党中央实行冒险主义，命令各地红军进攻中心城市。红一军团由闽西长汀向南昌开进，未攻城即转向湘赣边界。七月下旬，红三军团乘虚攻占长沙，数日后，因强敌逼近，撤出长沙，与红一军团在湖南浏阳永和市会合，组成

了红一方面军（又称中央红军）。朱德任总司令，毛泽东任总政治委员，朱云卿任参谋长，杨岳彬任总政治部主任。红一方面军成立后，再次进攻长沙，因几度强攻不下，便撤出了战斗，分两路向湘东和赣西挺进。

一九三〇年十月下旬，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和江西省行委在新喻县罗坊举行联席会议，通过了《目前政治形势与一方面军及江西党的任务》的决议，排除了李立三的“左”倾错误对红一方面军的干扰，同时在敌人的大规模“围剿”即将来临之际，确定了红军实行“诱敌深入”的作战方针，这就为后来粉碎敌人的“围剿”打下了胜利的基础。

中央革命根据地一、二、三次 反“围剿”的胜利

红军和革命根据地的迅速发展，严重地威胁着蒋介石国民党在湘、鄂、赣、闽诸省的反动统治。一九三〇年十月，蒋介石在结束了对冯玉祥、阎锡山军阀混战后，决定调集重兵，对红军进行大规模军事“围剿”，并把“围剿”的重点置于中央革命根据地。

一九三〇年十一月，蒋介石纠集十万兵力，以江西省主席鲁涤平为总司令，采取“并进长追”和“分进合击”的作战方针，向我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了第一次“围剿”。这时，红一方面军约有四万人，在毛泽东、朱德和方面军总部的指挥下，根据敌强我弱的特点，采取了“诱敌深入赤色区域待其疲惫而歼灭之”的战略方针，在龙冈地区，集中优势兵力，一举全歼敌两个旅和一个师部共九千余人，并活捉了